

读点大师



文化经纬

王学泰 著

王学泰自选集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科学精神，凝结着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主要体现在注重和谐、兼收并蓄、经世致用三个方面，在历经五千年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沉淀和传承后，绽放着绚烂的色彩。

中国华侨出版社

王学泰自选集·

文化经纬

王学泰 著



NLIC297081936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经纬 / 王学泰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6

(王学泰自选集)

ISBN 978-7-5113-1997-5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5692号

● 王学泰自选集 · 文化经纬

著 者/王学泰

出 版 人/方 鸣

特约监制/刘连生

选题策划/祁定江

责任编辑/小 乙

特约编辑/王文新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10.75 字数/200千字

印 刷/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997-5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 | | |
|----------------|-----|
|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 002 |
| 关于国学的随想 | 006 |
| 《论语》在文化史中地位的演变 | 011 |
| 当今的“读经热”与《论语》 | 075 |

第二辑 六经之外

- | | |
|-------------|-----|
| 漫谈幽默 | 082 |
| 笑话五题 | 099 |
| 鼎的文化演进 | 121 |
| 缠足、跷与性别歧视 | 134 |
| 模糊千年的一条民事法 | 145 |
| 说文人士大夫的消闲文化 | 158 |
| 中国饮食里的文化精神 | 185 |

| | |
|------------------------|-----|
| 话说游侠 | 206 |
|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再说游侠 | 219 |
| 江湖侠骨已无多 ——社会转型期间的游侠 | 231 |
| 从流氓谈到游民和游民意识 | 243 |
| 《三国演义》与游民 | 251 |
| 话说江湖 | 263 |
| 江湖人的梦 | 303 |
| 关公崇拜的形成 | 325 |

第一辑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纪念李慎之先生

七八年前，一天，李慎之先生给我打电话，直截了当地问：“你说，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许问得太突然，我一时回答不上来。接着李先生又问：“你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当他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放在一起说时，我恍然大悟：“文化传统应该是我们文明史中更本质、更坚牢一些的传统吧？大约也就是常说的‘道统’，或鲁迅常常讽刺的‘国粹’？而传统文化则指数千年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文化遗存。”李先生说：“我最近写了文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我就‘文化传统’问题问了很多，人人言殊。我觉得光是儒家道统还不够，真正能构成历数千年而不变，并被历代统治者所死命坚持的，传统中的最稳定只能是皇权专制主义，这是制度，也是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光是儒家的道统是不够的，法家的极端专制主张与儒家互为表里，甚至墨家、阴阳家、纵横家、老庄、佛禅等都是这种专制的支持力量。对这一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可能很好地处理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后来我读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文中概述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理论、特点和支持力量。在“前瞻”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作者并没有忽略承继本土资源的必要，然而，文中强调：

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认为无论如

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即使是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是他不难于转化出民主主义来。古人的许多嘉言懿行都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的源头。

可见李先生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做了很好的分割，而且指出了两者的关系。

可是这些并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近些年来保守之风蔓延，一些人打出保守派的旗号，他们不辨良莠，不加区分，对凡是与传统有关的事物，动辄奉上一顶“国粹”的高帽，做一些远离实际的吹捧。这种做法刺激了行内人和媒体的热情，相互炒作，几乎达到无物不“粹”的程度。先是说中国“四大国粹”：武功、中医、京剧、书法。此例一开，各门类紧紧跟上，昆曲、越剧等地方戏、曲艺，自然也属“国粹”之列。此外，儒学、老庄、诸子百家、国画、楹联，更是当仁不让。甚至围棋、象棋、麻将（“国粹网”就是以麻将为首页装饰，倡导“国粹麻将”）真有些令人五色神迷、目不暇接。谁要是“对国粹”稍有异议，往往会激起倡导者的愤怒，直欲“投畀豺虎”不可。这里说的“国粹”实际上指的是传统文化的各个门类，然而这样笼统地高扬“国粹”，并把它涂以道德油彩，给人们以为文化传统招魂的感觉。

自“五四”以来，“国粹”在新文化界是个负面词汇。鲁迅先生

曾说汉唐具有无所畏惧的气魄，因为那正是国家民族的强盛之时，对外来的东西，往往是来者不拒，照单收纳。而宋代衰弊陵夷之后，“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屠王和屠奴的宝贝”（《看镜有感》）。对于“国粹”，鲁迅说，一个事物“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随感录三十九》）。当然我们不能说鲁迅的话“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因为鲁迅把中国历史视为一部“吃人”史，把古代社会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个“国粹”指的是传统演进中的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国”之“粹”，就是前面说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专制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蔑视人的，不把人当做人，不承认个人价值。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在等级压迫、君臣名分等根本问题上又很少有弹性，一遇严重的天灾人祸，必然导致社会的震荡和动乱。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基本上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一治一乱”，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极大苦难，老百姓的“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就是对这种苦难的概括。旧朝代在战乱中垮掉了，新朝代诞生了。新朝代的出现和稳定往往是靠大量的消减人口实现的，改朝换代之际，人口的丧失比例极大，多的时候达到90%以上（如东汉末对晋朝一统），一般也要损失30%~40%。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都是以民众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的。专制主义不仅不能将中国引上现代社会，而且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本源。

李慎之先生强调否定（所谓否定就是实现制度变革）和批判（所谓批判就是进行启蒙教育）专制主义，因为它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有相当抗打击能力和超强的稳定性。专制主义对民众实施的政治上的剥夺，束缚了民众的头脑和手脚，并成为传统社会的最高价值，传统文化也深受其影响。不否定和批判这个传统，传统文化也不能充分展示其光彩。在我与李先生的交谈中，他曾说，西方只有否定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统治和野蛮的宗教裁判制度，基督教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爱”“忏悔”）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我们有长达三千年以上农业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中国的农业文明是发展最细密、最完美的一个。以此为土壤的传统文化自然根深枝茂，华灼实蕢，当此文明转型之际，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正在日益消失，引起各方面的有识之士的关注，本属自然。然而保存和张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划清与文化传统的界限，不要弄成不该丢的丢掉了，该丢掉的却依然故我，活得很滋润。

关于国学的随想

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这两则文化消息使得“国学”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国学”这个带有点“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始行于清末民初。说来可笑，它却“是外来语，并非国产”货（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篇就说到这一点）。它来自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将受清朴学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文献研究称之为“国学”。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走红的同时，这种学问再度兴起，与西学争辉，引起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的关注。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办了《国学报》，章太炎在日本时也以传播国学为己任，开办“国学讲习会”，鲁迅、钱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们从鲁迅的文章中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评鹭史事时受老师影响的痕迹。辛亥之后，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培养了许多国学研究的人才。他的《国故论衡》很有影响，太炎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其所主张“排满”革命的一部分，他强调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太炎先生在经学上属于“古文学派”，主张“六经皆史说”。他的“国

学”是告诉国人当以自己的历史为自豪。与其对立的今文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素王”（没有王位的圣王），把经学看作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学。章太炎在《癸卯狱中自记》中指出“国学不振”有三个原因，除了“新学”（即西学）外，还有“常州学派”（清代中叶复活的经“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把“今文学派”推到极端的“公羊说”。所以我以为章太炎的国学的政治性只是鼓舞国人的爱国热忱。而康有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学”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和根据《礼记·礼运》篇中对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记忆而设计了中国改革方案，要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明搬入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与康有为论战，不仅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

清亡之后，这两种“政治国学”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虽然仍是著作讲学不辍，这些活动主要是学术的。康有为虽然屡有“尊孔”“读经”的呼吁，但调门很大，回响极小，常常流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启超先生早已随着时代前进，与乃师分道扬镳了。

民国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体，各种新异的思潮涌入。而统治者认为“治理中国之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尚贤堂纪事》第六期），这虽是美国人李佳白的话，却颇合乎当时统治者的口味，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死把住权力不放的统治者面对许多新说，但还是觉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就是此类，他们或明或暗地向当局贡献条陈，于是《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一类的东西出笼了，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这些帮闲在鲁迅的笔下有点漫画化，但是像现

实中遗老孙雄（师郑）写《读经救国论》，康圣人为“辩师”张勋草拟治国方案，以及章士钊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与这些人相去有多远？

是不是五四以后就是割断历史，弃“国学”于不讲呢？我看不是。像鲁迅曾激愤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然而他不是也写作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吗（有人认为“国学”只是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儒学、诸子学、史学，不应包括文学。其实国学的经典著作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的中卷就是《文学总论》）？胡适也倡导整理国故。这些五四反传统的骁将都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他们不是以古人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更不是把它当做“应帝王术”去推销。而是用新方法、新的眼光和科学精神去重新研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许多高等院校成立了国学系或国学研究院。此时的国学不仅不与新学对立，而且借助了西方传入的新方法。许多国学家的还是饱学的欧美留学生。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典型。

这时的国学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国学了。刘半农就讲国学“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仓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子，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敦煌掇琐叙目·叙》）。这样的“新国学”可以分散到文学研究、历史研究、考古学、哲学、社会学、人类

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政治学等等许许多多的科目之中去，不必非要以“国学”相标榜。

自50年代以来，我们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确有“轻视古董，迷信未来”的倾向，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倾向被推到极致。那时解释《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竟能说成是“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见《〈论语〉批注》）。这种倾向使有良知的人们普遍厌恶，并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向慕逐渐形成一股热潮。那些乘机起哄炒作的求名争利之徒以及那些像高尔础、四铭一类炫世自售实际上另有所图者这里不说，真是有不少真诚的学人认为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是能够济人心、救世界的良方呢！

这种意见实际上是文化万能论。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的话，应该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这种经济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统和价值观念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间，我们努力的目标从经济形态上来说是工商社会，从制度建构上说是法治社会，从人与人关系上来说是契约社会。传统中的许多观念是不能适应这个转变的。儒家为什么强调“义利之辨”，因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不必考虑效率，有饭吃即可，而效率是工商社会第一要讲求的；又如宗法制度下差序格局，爱有等差，排斥异类，全族以大家长为核心，传统上又是家国同构，国内权力集中一人手中，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这如何与现代的法治社会、民主制度接轨？而契约关系要求交易双方平等，这也很难为传统认同。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发展得最为详密与完善的，地球无二。然而就根本价值上来说，它不能促进和适应当前的

社会转型。

农业是第一产业，可能它比工商文明更贴近人性和生活，它的缓慢的周而复始的节奏更能给人们的生理与精神上带来更多的放松，这些都使它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它将会被更多的人所钟爱。然而它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机制而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痛心疾首。

《论语》在文化史中地位的演变

一、开头的话

倡导“读经”已经有好几年了，其实真正认真读过儒家经典著作的并不很多，佶屈聱牙的《尚书》，说着好玩其实玄奥的《易经》，古人盛赞“微言大义”，今人不知就里的《春秋》，烦琐细微的《仪礼》《周礼》……没有多少人硬着头皮去碰，闹得特别红火的也只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在读《三字经》，本来古文、文言在大陆已经冷落有半个世纪了，能够点断文言的人已经很稀缺了，线装书只是作为“文物”“古董”，其价格在不断飙升，其使用率却在大幅度下降。我所在研究单位的线装书库很少有人光顾，当然这与近些年不断大量出版各种古籍标点本、校订本、笺注本、选本也有关。

不过最近“读经”热点有从“三、百、千”向《论语》发展的趋势，《论语》勉强可以算作“经”。这大约与于丹女士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上大力弘扬有关，她是一位被誉为“《论语》功臣”的女教授。她以自己的语言魅力，让彷徨于多种苦闷中的民众发现了原来中国古代还有一本能够抚慰人们心灵的图书——《论语》。《论语》本来如“布帛菽粟”凡是读书人都不能不接触的，只是因为近些年来人们疏于读书，它才变得陌生起来。

听说前两年出版了一本《男论语·女论语》名字颇怪的书，也没

有怎么火。可能是炒作不够的缘故。其实传统的《论语》本身就是男《论语》，因为这本书就是留给（那时还没有“写给谁看”的意识）男人看的，书中很少涉及女性，大约只有四五处，除了“太姒”（周文王的妻子武王之母）外，几乎都是负面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知名并且留下对后人影响的著作的才女是2000年前曹大家（音“姑”）班昭。她是历史学家班彪的女儿、开拓疆土名将班超的妹妹。她为妇女界写了《女诫》七条，后来又被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姊妹发展为《女论语》，虽然是为女人写的，但立场却是男人的，是教给女人如何伺候男人的。这正像中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编纂者、鲁迅的上司夏增佑对鲁迅说的“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隶，宋以后男子全为奴隶，而女人乃成物件矣”。《女论语》出现大约就是女人变成“物件”的标志吧。讲《论语》说到这些似乎有些煞风景，不过，意在告诉大家《论语》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就是说它还是有许多局限的，起码这本书中几乎没有讨论过人类中的另一半。

现在，媒体就希望群众有关心的话头，一有话头，马上炒作，使红者更红，黑者更黑。本来多年不谈《论语》，突然于丹女士开讲，引起人们关注，媒体因风就势，三炒两炒，《论语》“发迹变泰”了，颇有点恢复旧观的模样。甚至我所居住的偏僻的小区里也在数处张贴了“劲松街道文明市民学校”编纂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理名言》，其中出自《论语》的就占了一大半。《论语》受到如此的关注，“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是读书人共同心理。因此，人们关心《论语》的作者、编者、来历，以及流传两千多年的命运，也是极其自然的事。